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 文学的现代阐释

蒋承勇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I1099
6
2

浙江省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 文学的现代阐释

蒋承勇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 112号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吸取现代美学、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系统科学等新观念、新方法，重新阐释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特征和现代意义，指出了它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以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又从文艺美学、文化哲学的高度对其作思辨性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为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文学观念与方法。本书适合于文学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使用。

责任编辑 吴学先

图 书 在 版 编 目 (CIP) 数 据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蒋承勇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ISBN 7-04-005349-7

I . + … II . 蒋… III . 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研究-世界
IV . I1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1224 号

*

高等 教育 出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印 刷 厂 印 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30 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 295

定 价 8.30 元

文学史的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

——[英] T·S·艾略特

为什么要思考艺术？可能的回答是：思考艺术即反思人类自身！因为艺术是人类存在的诗意栖居之地，是我们生命的家园。

——[法] 维克多·雨果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序

郑克鲁

19世纪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在我国一直获得高度的评价，这毫不奇怪，因为它既是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高峰，又是外国文学发展的高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极其杰出的成就。可是，长期以来，我国评论界对19世纪外国现实主义文学较多地从社会历史的批评角度来研究，视野不免失之于狭隘。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介绍到我国，多角度地研究19世纪外国现实主义文学，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蒋承勇的这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尝试。这是他十多年来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三个理由。

首先，《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不是孤立地去评价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与20世纪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从发展眼光去衡量和分析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蒋承勇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他们既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刻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同时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揭示人类深层的精神-心理内蕴。因此，他们的创作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又具有文化批判的深刻性………酿就了20世纪的现代文化基因。”他还进一步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完成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文化基因的积累过程，沟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内质上的血缘联系；另外，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倾性、主观性和表现性的倾向，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也是一脉相通的；在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上，两者并不是迥异的，而是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一论断准确地抓住了外国文学的一个发展特点，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蒋承勇的论述是令人信服

的，对以往的观点是一大修正。过去，不少评论家都援引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些言论，认为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彻底反叛、彻底否定。其实，这只是表明了现代主义作家力图摆脱以往的窠臼，勇于创新的愿望而已。现代主义作家不可能与19世纪现实主义完全割断联系，一刀两断，两者在任何方面都截然相反。不错，现代主义不同于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着质的区别，然而，现代主义不可能凭空产生，它的创作方法必然有所依托，这种依托正是包括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和创作手法。蒋承勇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基因的联系与发展，阐述了内倾性、主观性、表现性的开拓与发展等方面的前因后果，深入地指出了这两种表面上看来迥异的文学流派的内在联系。这是符合实际的，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

其次，《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观点、新方法，例如关于内倾性的论述、系统论、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蒋承勇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些作家存在着外倾性与内倾性两大类，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属于外倾性作家，即这些作家更多地从外部社会形态上去反映社会和塑造人物；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属于内倾性作家，即他们更注意展示人的心灵世界。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心理机制，构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刻性。而内倾性作家与后世有较多的联系，20世纪作家的内倾性与此一脉相通。蒋承勇进而从19世纪作家的心理原型的角度，去探索作家的主体性与表现性特征，拓展对内倾性的阐述。系统论似乎与结构主义有较多的联系。蒋承勇在对《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的性格进行分析时，指出这个形象的多元多层次结构，它的核心部分与其他因素的制约关系，从而形成具有系统性的整体功能。这一分析较清晰地显示了形成于连性格的诸因素。同时，蒋承勇以接受美学的观点，分析了读者的审美心

理与人物形象的实际的差异性，指出两者往往会出现“错位”现象，这种现象使得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具有丰富多样性。

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出现的重要文学批评流派，在欧美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的文学批评较为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的话，那么，20世纪的文学批评的重大功绩，则在于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作出了较深入的分析，而且注意从读者的角度去研究文艺作品的意义和影响。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对文学作品的切入点是别开生面的，这两种批评方法自80年代介绍到我国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批评家从中得益非浅。从蒋承勇分析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所运用的这两种批评方法来看，应该说，是颇有新意的，尤其对于连性格的剖析有独到之处。

第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能以理论分析与实例相结合，即以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来印证作者所提出的理论。蒋承勇于从理论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对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十分注意从理论问题着手。例如，他指出：“现代认识论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性质不仅依赖于刺激物的性质，也依赖于感觉的结构和机能的性质，依赖于感受体的内部状态。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个感受体就是作家的心灵世界，更确切地说就是作家的审美心理机制。”他从这一理论高度去考察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创作特点。他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等大作家为例，分析他们的审美心理机制的特征。理论与实例紧密结合，既体现了以理论性见长的分析特点，又以实例相印证，不流于空泛。同样，在分析司汤达小说中的主人公时，蒋承勇从反映的变形这个新角度去剖析这些人物，以便说明在司汤达的创作中主体意识的体现。他指出，从司汤达小说的各个主人公身上，可以发现作家的原型——深层构架。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心理原型是司汤达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获得的情感、意识等内容凝结后的产物，其中蕴含了作者自身的人格力量。”他接着从

宏观、中间、微观三个层次去分析司汤达的主体意识在作家笔下人物身上的表现，或者说变形的表现。这一章节处处紧扣理论阐述，高屋建瓴地去观照司汤达的人物塑造，条分缕析，脉络清楚，给人以启发。这部专著的各个章节都具有上述两例的特点，理论框架相当严密。虽然每一章节都可以单独成为一篇篇论文，但在总体上则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使这部专著具有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优点，避免了一般泛泛的论述 19 世纪文学，又不过分流于理论概念的枯燥演绎。在近来出版的论著中，这样的论述方法并不多见。

此外，蒋承勇的视野是相当广阔的，搜集的材料不可谓不多。他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出于教学需要，他必须广泛接触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然而，教学工作的要求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没有个人孜孜不倦的钻研是不可能深入地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的。况且，从这部专著所涉猎的范围以及所引用的材料来看，足以见出蒋承勇阅读书籍的广泛和细致，这里包括大量的理论著作和作家传记、评传等等。应该说，这样相当广博的知识是他能够研究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扎实基础。

蒋承勇是学有所成的青年文学研究者，这部专著的问世只是他在研究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期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1994 年 7 月 29 日于上海

目 录

序言	1
导言：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	1
一、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我们	1
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3
第一章 现代文化基因的原始积累与“批判”的双重超越	6
第一节 上帝不是在一夜间死去的	6
第二节 司汤达：自由的困惑	11
一、人身自由的追求	11
二、心灵自由的追求	13
三、自由的困惑	16
第三节 托尔斯泰：堂吉诃德与西西福斯的融合	22
一、他曾经是一个浮士德	22
二、“阿尔扎玛斯的恐怖”	27
三、寻找新的上帝	30
第四节 巴尔扎克：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忧思	36
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悖谬	36
二、对“恶”的崇拜与恐惧	41
三、“无尽挽歌”为谁唱？	45
第五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定位的困惑	47
一、人是“虫”？	48
二、人是“兽”？	51
三、人是“上帝”？	53
四、在“困惑”的背后	56
第六节 福楼拜：跋涉于沙漠中的骆驼	59

一、“幸福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悦，叫你付上一船的不幸。”	60
二、“我要的是无限里的美丽，我寻见的只是怀疑。”	65
三、“我有一个非常过分的欲望，可是我从来没有给它们一个满足。”	69
四、“我已安心做一辈子苦工，不再想望什么报酬。”	71
第七节 左拉：“人”的神话的陨落	74
一、“新人”形象的凸现	75
二、把人还原为生物	78
三、西方文化链条上的一环	84
余论	87
第二章 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	90
第一节 审美心理机制与创作风格	90
第二节 司汤达：人的激情-心理的描绘者	93
一、司汤达的审美心理机制	93
二、注重人物心路历程的描述	94
三、披露人物的深层心理	97
四、把注意力集中在性格“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102
五、几点启示	104
第三节 托尔斯泰：人的精神-心理的描绘者	105
一、托尔斯泰的审美心理机制	105
二、揭示社会表象背后人的精神-心理状态	108
三、物景描写的心灵化	111
四、展示意识流动的无序状态	113
第四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心灵之谜的破译者	115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心理机制	115
二、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疏离态	118
三、人物自我意识的双向悖逆	120
四、不同自我意识的多层次对照与象征性	123

第五节 巴尔扎克：史无前例的“物本主义”者	125
一、巴尔扎克的审美心理机制	125
二、环境：物质性与有序性	128
三、人物：淹没在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	130
四、细节：“物本意识”指导下的精确性与细致性	133
第六节 狄更斯：想象与虚构中的外部世界	134
一、狄更斯的审美心理机制	134
二、故事性与娱乐性中的社会批判性	137
三、人物性格的“外壳化”	142
四、渗透着激情的物景描写	144
第七节 福楼拜：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	148
一、福楼拜的审美心理机制	148
二、社会风俗画与现代神话	152
三、客观的呈示与冷峻的叙述	156
四、故事性的消解与散文化文体	160
余论	162
第三章 心理原型的外化与反映的变形	167
第一节 心理原型与现实的重构	167
第二节 司汤达的心理原型与反抗者群像	171
一、人物性格的深层构架	171
二、人物性格构架与作家心理原型的静态描述	175
三、人物性格构架与作家心理原型的动态描述	178
四、生活场景与作家心理原型	182
五、司汤达小说的“变形”与现实主义传统	183
第三节 巴尔扎克的心理原型与金钱时代的心灵世界	184
一、巴尔扎克小说艺术世界的两个层面	184
二、投射在人物身上的对金钱的渴望与焦灼	186
三、发掘了金钱时代的社会群体心理	192
第四节 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	194

一、狄更斯的心理原型	195
二、飘浮在“真空”中的童话式人物	198
三、由悲到喜、善恶有报的童话式结构	201
四、超现实逻辑与童话式的神奇	204
第五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原型与畸形的世界	208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原型	209
二、世界：“涅瓦河幻影式”的怪诞与恐怖	213
三、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郁与绝望	214
四、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与扭曲	216
第六节 托尔斯泰的心理原型与探索者群像	219
一、托尔斯泰的心理原型	219
二、男性形象与作家心理原型	221
三、女性形象与作家心理原型	224
四、“爱”的母题与作家心理原型	226
余论	228
第四章 于连性格系统论	230
第一节 系统的整体性原则与于连性格的多元多层次 结构	230
一、于连性格系统中的单一性元素	231
二、于连性格系统中的两重性元素	233
三、于连性格系统的多元多层次结构	235
四、于连性格系统的整体功能	239
第二节 从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 自主性	241
一、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理解的误区	241
二、于连性格系统的初始状态的形成	244
三、于连性格系统的自组织功能	248
四、结论	253
第三节 于连性格系统的审美透视	253

一、不同期待视野中于连形象的丰富多样性	253
二、小说文本的“接受指标”对阅读的制约	260
三、作者在于连性格系统中的主体投入	262
余论	264
结语	266
后记	268

078904

导言：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这显然一个陈旧的课题。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理论课题，不管人们已作了多少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至今仍然有许多课题尚待深入研究或重新审视。特别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更有其现实的意义。

一、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我们

当作家把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感受、体悟和理解用文字符号构建成文学文本之后，人类的精神现象就被物化了，文学作品就以物质的存在构成漫漫的文学史长河。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的长廊就是人类精神、心理、情感的历史博物馆，世界文学史上难以数计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人类来说似乎也成了与他们没有直接牵连的“历史文物”。然而，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文学的本质意义上的存在并不是物质形态的，而是精神形态的。因为，文学作品不是供陈列之用的，它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参与才显示其价值，显示它与人类的依存关系。文学作品也就是在被读者阅读、理解、接受并产生共鸣的过程中才实现其本质意义上的存在。那些被一代代人公认的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学精品和经典，它们记录和传达了不同时代的人的情感与心理体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的生存状态。它们由于是“名著”，因而总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它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由物质形态的文本一而再地、无穷尽地转换为无形的、弥散性的、流动的和混沌的精神形态，因此，由这些文学名著构成的世界文学史，是永远充满生命活力，永远与人类同

在的。由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总是具有不同的审美期待视野和现实的功利需求，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文学名著，因而文学名著也就不断地被重新理解，显示新的审美效应，文学史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面向当今，面向我们的。

在我国，“现实主义”曾经享有崇高的甚至独尊的地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最合理、最有价值、最能体现艺术创作规律的；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了评判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正因为现实主义在我国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所以，在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中，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也是“一枝独秀”，比其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都获得了更多的承认和接受。因而，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最多，研究也最深入。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这些在特定时期里取得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未必是研究得最成功最透彻的。19世纪现实主义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显然应具有现代意义。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这里不妨简要列举一些历史事实。

“现实主义”的概念是“五四”运动前后从欧洲传入我国的。我国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与接受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一方面接受外来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苏联的），而缺乏深入全面地研究，另一方面从“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的民族文化心态出发，取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符合我国现实需要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种民族化、本土化和功利化的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现实主义”理论以后又成为一种既定的规范和原则，用于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和文艺批评，并且还反过来作为选择与研究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的基本尺度，用这些作家作品来证明这个既定的理论。因此，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被“中国化”之后，似乎改变了自己的面目。这恐怕就是我国现实主义研究中的一大

特点。它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必然也有某些不良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国理论界曾经发生了多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重大论争，但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很少有新的突破，“现实主义”也总是那副老面孔。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和研究层次上，一段时期里，现实主义在主体论的讨伐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我们当然要看到主体论者对现实主义的某些非难是片面性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以往我们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本身的不足，也基于我们对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理解和研究的不全面、不深入，因而不乏合理的成分。所以，如果我们能跳出以前从理论到理论，用具体的作家作品去印证一种不完备的理论规范的思维怪圈，深入到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中去，客观公允地去体悟、剖析与开掘这一流派的原本艺术品格和美学内涵，让人们对它有一个更全面准确的认识，这对维护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声誉和地位，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显然是有现实性和现代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可以说，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面向我们的。

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要使我们对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研究有所发展，就必须摆脱既定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在消解了“现实主义”的种种固有限定之后，换一种视角，换一种评判尺度和参照系，从新的层面重新审视它。笔者认为，“××主义”之类的名称，作为对某一特定时代具有共同美学倾向的作家作品的归类，是有助于人们认识与把握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的。但是，一旦众多的作家作品被纳入到“××主义”的门内，并用“基本原则”的封条永久地将其禁锢起来之后，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文学现象也就变得单调刻板，缺乏生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就会产生片面性和误解，研究本身也就失去意义和魅力。为了避免这种局限，笔者在研究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一方面承

认“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对这一段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历史限定，另一方面又尽量突破“现实主义”的陈规，力图用自己的观点重新解说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内涵。虽然这同样难免有失偏颇，但可以免去重蹈覆辙之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现代主义是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中孕育成长出来的。按常理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发现，因为，文学的继承性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如所周知，现代主义作家认为自己是彻底地反传统，反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也在排斥现代主义的同时，竭力否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内在联系，以维护现实主义的尊严，大有与现代主义誓不两立之势。这种固守陈规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主义者宣称“反传统”一样是封闭性的，两者都违背了文化史和文学史发展的固有规律。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作为精神形态而存在的文学是在读者参与的过程中显示其存在的永久性的话，那么，作为物质形态而存在的文学文本，则因其中蕴含了人类深层的精神-心理本原而绵延相接，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是以螺旋式的圆周运动向前推进的。从这种深层文化意蕴的角度看，所谓文学史的“传统”与“现代”的界定都是人为的和暂时的，现代的文学可以说是包含了传统文学母题的不同形态的重现，或者说是传统文学的同源变体。当然，这样说可能会被视为着在文学发展上否认了创新的意义，因而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用这种认识方法来说明文化史和文学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延续性，说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的“遗传关系”，是不能说没有道理的。在本书中，笔者既努力论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化基因上与现代主义的血缘关系，也客观地阐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初露端倪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倾向。当然，这种美学倾向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性”便是19世纪现实主义为它的后继者——现代主义所提供的创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由此，我们就找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